

# 唐代诗人爱牡丹

在大唐盛世,牡丹花名冠天下,有研究者说牡丹花是唐代的国花。诗人刘禹锡《赏牡丹》诗云:“庭前芍药妖无格,池上芙蓉净少情。唯有牡丹真国色,花开时节动京城。”

赏牡丹成为唐人的时尚。牡丹原生于山谷丘陵。成书于汉代的《神农本草经》说:牡丹“一名鹿韭,一名鼠姑,生山谷。”据《海山记》记载,喜欢奇花异草的隋炀帝把牡丹移植京都。唐朝时,长安的牡丹种植得到迅速发展,当时已出现种植牡丹的花师。柳宗元《龙城录》记载:“洛人宋单父,字仲孺。善吟诗,亦能种艺术。凡牡丹变易千种,红白斗色,人亦不能知其术。上皇召至骊山,植花万本,色样各不同。赐金千余两,内人皆呼为花师。”

在唐代,宫廷寺观、富豪庭院、百姓民宅种植牡丹蔚然成风,并且培育出众多品种。作为东京的洛阳,牡丹种植业也得以迅速发展,其规模不亚于西京长安。每到谷雨前后,长安、洛阳以及城郊,牡丹盛开,香气袭人,人们携带酒食,结伴而行,赏花踏青,牡丹园中的人群摩肩接踵,络绎不绝。春赏牡丹,已成为唐人的时尚,李肇《唐国史补》载:“京城贵游,尚牡丹三十余年矣。每春暮,车马若狂,以不耽玩为耻。”白居易的《牡丹芳》描写道:“遂使王公与卿士,游花冠盖日相望。库车软舆贵公主,香衫细马豪家郎。”“花开花落二十日,一城之人皆若狂。”

唐人赞美牡丹为“国色天香”。牡丹花色泽艳丽,雍容华贵,素有“花中之王”之誉,象征着高贵、高洁、典雅的精神品质。因为唐朝的皇帝多爱牡丹,被誉为“国色天香”。苏鹗《杜阳杂编》载:“上(唐文宗)于内殿前看牡丹,翹足凭栏,忽吟舒元舆牡丹赋云‘俯者如愁,仰者如语,含者如咽。’吟罢,方省元舆辞,不觉叹息良久,泣下沾臆。”李潜《松窗杂录》记载说,程修己因绘画水平高,得以进谒唐文宗李昂。文宗正在内殿欣赏牡丹花,因喜欢诗,便问程修己:“现在京城传唱的牡丹诗中谁写得最好?”程答道:“在公卿士人中多吟赏中书舍人李正封的诗,曰



‘国色朝酣酒,天香夜染衣’。’文宗赞叹一会,笑着对爱妃说“在你的妆镜台前饮美酒,唱正封之诗。”牡丹的“国色天香”之美誉由此而来。唐高宗李治在后苑宴请群臣,乘酒兴观赏双头牡丹并赋诗。上官婉儿的诗联“势如联璧友,心似臭兰人”惊艳绝伦,意思是双头牡丹姿态犹如相连的璧玉般并美的友人,内心好似轻嗅兰花的高洁之士。《杜阳杂编》记载:“穆宗皇帝殿前种千叶牡丹,花始开,香气袭人,一朵千叶,大而且红。上每覩芳盛,叹曰:‘人间未有。’自是宫中每夜即有黄白蛱蝶万数,飞集于花间,辉光照耀,达晓方去。”

在唐人的眼里牡丹是美的化身,是纯洁与爱情的象征。早在春秋时期的《诗经》里就有赞美牡丹的诗句:“维士与女,伊其相谑,赠之以芍药。”描写的是三月三上巳节,青年男女相约春游,一位男子向心仪的美女赠一朵鲜艳的牡丹,表达爱慕之情。李商隐有《牡丹》诗云:“锦帏初卷卫夫人,绣被犹堆越鄂君。垂手乱翻雕玉佩,折腰争舞郁金裙。石家蜡烛何曾剪,荀令香炉可待熏。我是梦中传彩笔,欲书花叶念中的情人如花似玉。艳冠群芳的杨贵妃也极爱牡丹,在宫廷上苑遍植牡丹。

贵妃率众宫女游赏花间,花与人相映成美。李白有诗赞之:“云想衣裳花想容,春风拂槛露华浓。若非群玉山头见,会向瑶台月下逢。”

唐人舒元舆的《牡丹赋》说,武则天的家乡种有很多牡丹,玉笑珠香,京城宫苑里却没有,于是她命人将家乡的珍稀品种移栽到都城来,可见武则天极好牡丹。唐人张洎在《控鹤监秘记》中讲述了“武则天贬牡丹”的故事,武则天在一个冬日醉酒后游园,突然来了兴致,即命婉儿拟檄,令百花开放。婉儿遂拟一诗曰:“明朝游上苑,火速报春知;花须连夜发,莫待晓风催。”园中的百花慑于武后的权势,都违时开放了,唯独牡丹仍干枝枯叶,傲然挺立。武后尽管喜爱牡丹,但是牡丹“抗旨不遵”令她勃然大怒,便火烧牡丹,并贬至洛阳。而牡丹一到洛阳后,恰逢暮春,昂首怒放,花繁色艳,十分壮观。这段故事尽管是传说,但是表现了牡丹不畏权势,遵循自然规律,不苟且,不媚俗,不妥协的品格。

牡丹在唐朝已成为一种产业。牡丹既可观赏,又具有实用价值,还有人将牡丹种植作为产业。《唐国史补》载:“人种以求利,本有值数万者。”牡丹花可药用和食用。以根皮入药,称牡丹皮,又名丹皮、粉丹皮、刮丹皮等,系常用凉血祛瘀中药。孙思邈的《千金要方》中,就有数十个药方

采用牡丹和牡丹皮作为药剂,其中又以妇方最多。有不少地方用牡丹鲜花瓣做牡丹羹,或配菜添色制作名菜的。牡丹花瓣还可蒸酒,制成的牡丹露酒口味香醇。张又新《牡丹》诗云:“牡丹一朵值千金,将谓从来色最深。”李商隐说:“终销一国破,不啻万金求。”

唐朝文人善咏颂牡丹。牡丹绚丽、清雅的身姿和具有富贵、吉祥、幸福、繁荣的象征,为大唐盛世的文化繁荣注入了勃勃生机,成为文人雅客绘画咏诗的重要题材。周敦颐在《爱莲说》中说“自李唐来,世人甚爱牡丹”。唐朝文人喜欢牡丹近似疯狂,或绘画,或咏诗,或歌赋,以牡丹抒情,或赞美,或相思、或兴奋,或消愁,渗透到生活中的每个角落,可谓须臾不可离。唐人韦绚《刘宾客嘉话录》记载,最早画牡丹者是南北朝的画家杨子华。据画史记载,唐朝不乏画牡丹的丹青妙手,他们的画作或润秀清雅,或泼辣豪放,幅幅神态各异,生动传神。如长安的边鸾最擅长画花鸟折枝,他所画的牡丹千姿百态,生机盎然。

在唐代之前,文学作品中提及牡丹的十分罕见,唐朝讴歌牡丹的诗词大量涌现,有人统计描写牡丹的唐诗共有200首之多。白居易最爱牡丹,与洛阳牡丹结下了深厚感情,他在《牡丹》一诗中写道:“绝代有西子,众芳惟牡丹。”《买花》一诗中描写了牡丹盛开时节万人空巷,相携往观的壮观景象:“帝城春欲暮,喧喧车马度。共道牡丹时,相随买花去。”《惜牡丹》云:“惆怅阶前红牡丹,晚来只有两枝残。明朝风起应吹尽,夜惜衰红把火看。”爱花惜花之情溢于言表。

有人统计白居易一生写下了十三首牡丹诗。白居易的好友元稹也是爱牡丹之人,他在《西明寺牡丹》写道:“花向琉璃地上生,光风炫转紫云英。自从天女盘中见,直至今朝眼更明。”徐凝《牡丹》云:“何人不爱牡丹花,占断城中好物华。疑是洛川神女作,千娇万态破朝霞。”诗人通过赏花的主观感受间接表达了牡丹之美,表现了诗人对牡丹花的喜爱。

(据《齐鲁晚报》)

◎收藏

## 南宋江州钱牌

近日,笔者在古玩市场上看到一枚浑身沾满黄泥土、呈长方形的铁块,摊主告诉我,这叫钱牌,是在建房挖地基时从地下挖出来的。我拿在手里掂了掂,感觉不一般,我轻轻地拂去了上面的泥巴,钱牌上面露出“准拾捌界江州行使”几个

字,背面上端有“使”字,下端为官押符号,符号右上侧凿“权宜便民”四字。通过钱牌上面的铭文,我得知这是一块南宋时期的钱牌,发行量不大,是钱币中的珍品。

钱牌是南宋特殊的产物,其为何用?因为史无明载,历来专家也就各行其说。一说铸于南宋初年,是宋高宗行军代用币。试想当年,高宗南渡后屡被金兵追击,曾流亡扬州、南京,后又乘船入海避乱,直到建炎三年金兵北归,才置行宫于杭州,当时称作“行在所”,不久升州为临安府,长期定都于此。据说钱牌曾在临安府一带发行,目的是弥补军用之缺,此说也不无道理。另一说认为钱牌的铸行当在宋理宗淳祐和景定年间,即南宋末年。

我收藏的这块南宋钱牌,四角圆折,呈狭窄长方形,长7.2厘米,宽2.3厘米,厚0.2厘米,上头中间有穿眼,便于用绳子穿引。用放大镜观察,钱牌上这种黄泥土为长江南岸标志性的土壤结构,钱牌上的铭文尽管因年代久远遭到不同程度的腐蚀,但遒劲有力的字体依稀可辨。经鉴定,这枚钱牌的材质为铅,这和南宋时期,建都临安之初,广铸铁钱,数量版别巨多恰恰相反。这种铅铸的钱牌传世不多,还是极为珍贵的,也是研究南宋货币流通的珍贵实物史料。(据《西安晚报》)



◎鉴赏



## 电话烟标

1900年,我国第一部市内电话在南京面世,当年上海、南京电报局开办的市内电话仅有16部固话。从那时到现在历经100多年的发展,固定电话一度普及到千家万户。如今,它逐渐被更为先进的手机所取代,要想在各类藏品市场上寻找固定电话的影子着实不容易。

大新烟厂出品于上世纪40年代的“电话牌”烟标,主版是一部壁挂式电话。黄金烟厂出品于同期的“电码牌”烟标,主版图案描绘的是一部黑色拨盘电话机,显示在该机拨号圆盘中心的数字,与浮现于话机上的一组红边空心数字一样,均为“62417”,这组数字究竟是否为该烟厂当时的电话号码,现已不得而知。天津和胜烟厂出品于上世纪50年代的“话机”烟标,主版图案所展示的也是一部黑色拨盘电话机,拨盘中心显示着一个红色的“1”字。当时一些提供服务的电话号码也曾出现在烟标上,如地方国营凤城县烟末厂出品的“凤凰牌”烟标,于主版凤凰图案下方,就印有该厂厂址及“电话210号”字样。

在少得可怜的电话烟标上,笔者竟然还发现了打电话的人物形象。上世纪30年代,中国中亚烟厂出品的“交际花”烟标,主版就是一名时尚美女,她左手拿着听筒靠近右耳,正在打电话,观其面带笑容的愉悦表情,猜想她听到的可能是一则喜讯。

这几枚烟标在反映人们对电话的认知和使用的同时,也从一个侧面记录了固定电话在我国的发展历程。(据《西安晚报》)